

的有力证据；发掘于乌兰察布盟凉城县西北部蛮汉山区永兴毛庆沟缓坡上的毛庆沟墓地，属于春秋战国时期，发掘出的80多座墓葬，绝大多数属于游牧民族北狄的东西向墓坑，有10多个属于中原民族南北向葬坑，这是游牧民族和中原民族两个不同生活习俗的民族共同使用一个墓地的情况，客观地反映了古代这里的各民族和睦相处平等生活的历史事实。

战国时期，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例，他开创性的将短衣窄袖分叉裤的胡服运用到了军事训练和作战中，彻底改变了中原军事、服饰文化，客观上为游牧和农耕两种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条件，为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提供新的活力；秦国大将蒙恬主持完成的规模宏大的“高速公路”——秦直道，不仅仅是单纯军事道路，又兼具民用交通的功能，对于维系、沟通草原与中原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西汉元帝时期，王昭君毅然出塞，实现胡汉和亲，化干戈为玉帛，消除芥蒂，化解矛盾，达到团结、联合、共存，营造出有利于国家、民族发展的政治环境；有“千里画廊”之称的阴山岩画，涵盖了匈奴、突厥、回鹘、党项等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作品，是由不同民族共同缔造的，它像一个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大观

园，从多角度、多侧面直射或折射了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北魏时期，孝文帝主动学习汉文化，提倡农桑，全面推行汉制，营造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极力倡导思想的融合、民族的融合、文化的融合。

“万国河山有燕赵，百年风气尚辽金”，辽金时期是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又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辽以原生文化为主体，以中原唐文化为依托，汲取西域、东北各民族先进文化的内容，构成了博大精深的“契丹文化”。

明朝时期，阿勒坦汗和三娘子维护与明朝的贡市关系，达成“隆庆议和”，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符合长城内外蒙汉各族人民渴望安定的愿望，千里边关出现了“醉饱讴歌，婆娑忘返”的情景；明清时期，以大盛魁为代表的晋商、旅蒙商在敕勒川经商贸易，沟通了内地与草原的物资交流，促进了农业、牧业的协调发展；由“走西口”演绎而来的戏苑奇葩“二人台”，糅合了晋、蒙、陕、冀文化素养和游牧民族的蒙古长调，是蒙汉民族文化融合的典型艺术形式，为敕勒川各族人民喜闻乐见；近现代以来，敕勒川地区群星璀璨，人才辈出，涌现出了大批的教育家、实业家和革命家，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御外辱，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做出了积极